

CS1-53
H33

何肇发文集

何肇发 著

荣誉出版社

·香港·

何肇发文集

荣誉出版社

BAR CODE WORKSHOP

8H. Kingley Ind. Building

Block 2, 35 Yip Kan St.,

Wong Chuk Hang,

Hong Kong

Tel: 25540838

Fax: (852) 28733620

ISBN 962 - 929 - 090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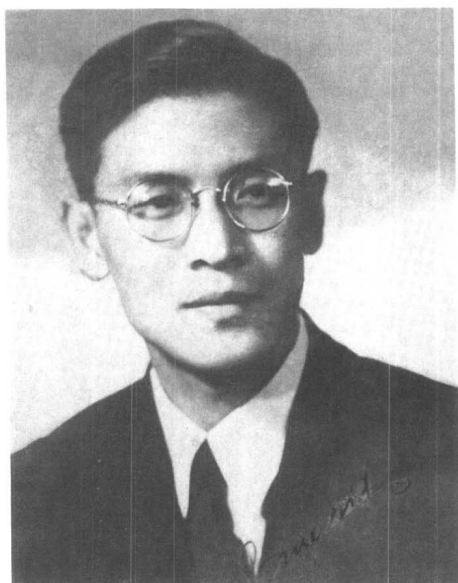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9.25 印张 12 插页 48 万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港币 98.00 元



何肇发教授（1987年6月）



大学时代的作者



前妻刘玉杰



意大利威尼斯码头。威尼斯没有马路，到处河道纵横，以舟代步
(1987年11月)



1987年11月摄于法国巴黎协和广场后湖



1991年与法国人类学家阿兰·勒彼松和意大利诗人
白古里尼摄于西班牙西北角大西洋畔坎本南迪皇宫



与塞内加尔行吟诗人摄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鲁汶大学交替
文化研究中心



1986年6月国际社会学会社会组织主题会议，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



1986年摄于德国莱茵河畔



1987年应法国外交部邀请在法国科学院作有关中国农村发展的学术报告。站立者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亨利·孟德拉斯



1992年与子志宁摄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大教堂前



西班牙肯坎南大教堂内大弥撒前烧起巨大香炉，然后吊到教堂高空。教徒呼天叫地爬在地上，请求上帝宽恕。若未见此场面，就不知欧洲人民对宗教的狂热



1986年摄于罗马斗兽场内



1982年摄于白宫草坪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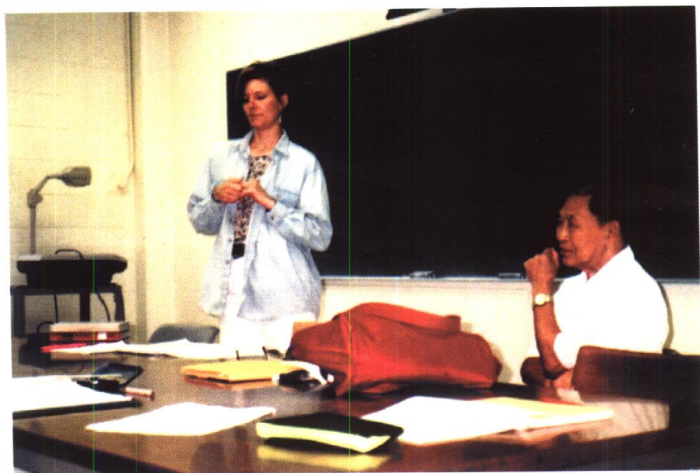
与妻东菊摄于巴黎



与妻东菊在巴黎协和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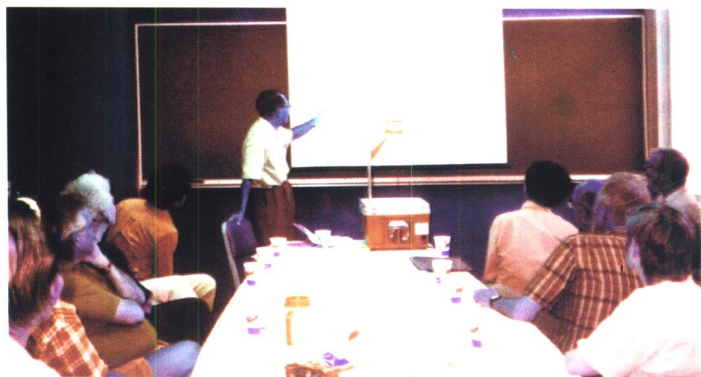
1986年在柏林花会之晚上与一些演员合照



1994年听取爱荷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宣读论文



1987年李先念总理访问法国，法国总统以法国传统御林军相迎，作者偶尔拍得此照片



199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向教师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报告



1994年与东菊重返美国UCLA母校，于希腊武士铜像前



1997年于布拉格街头



1997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



与德国社会学家、何志宁博士导师、科隆大学E·K·Sdeach教授合影

自序

我1921年出生，家境贫寒，世居广州。那些年月，中国军阀割据，生逢乱世，一个少年当时就铭记着人民的苦难，当官的压迫老百姓，是非黑白都刻在心里。在读明达小学时，有一位方老师是在读的大学生，就经常和我们谈要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救老百姓，后来还和我们谈萧楚女、张太雷在广州城里闹革命的事。小小的心灵中已经分清了好人和坏人，有了爱恨分明的界限，那些当官的和那些有钱人在当时的愉园、文园大酒楼花天酒地，而穷人却是一天不得两餐，生活在半饥饿中。记得祖母买一根油条给我作早餐，还得与弟弟一人分半条。

“九一八”事件，全国唱起不愿做奴隶的救亡歌曲。日本鬼子的入侵，的确唤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激奋。我们所住的文昌北路东四巷贫民窟的小孩和青少年都起来唱救亡歌曲，平静的小巷沸腾起来了。我们初中和高一的学生都参加了军训，准备上战场打击日本侵略者。全家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广州东郊鸡颈坑集训营地，和教官齐喊誓死保卫广州的口号。一个下午，在操场和一些小军官们正摩拳擦掌准备迎头痛击日本侵略军，一位团级教官还说今晚要发给我们枪支弹药，明早即实弹射击，怎知夜里八九点，听说日军已在大鹏湾登陆。当时是传闻，后来大家跑到团里找那个教官问个明白，怎知团里人都走光了，那个教官已跑回广州带着妻儿逃之夭夭。满腔热血的一群青年已是群龙无首，回宿舍丢了脚上的草鞋，换上一双“力士鞋”，挂上背包冲出营门，便随着人流沿现在的广从公路逃跑。我们只有大骂余汉

谋（当时的国民党军长）、吴铁城（当时的广州市长），没吃没住一口气跑到鹤山沙平，暂在一个同学家休息了两天，便又上路跑到香港，住在父亲“二奶”住的小阁楼里。那时的香港是内地的富豪军政要人逃难的地方，纸醉金迷，稍有爱国心的人都无法住得下去。于是我们几个逃到香港的中学同学便决定搭从香港到越南海防的轮船，在“仓底”“屈蛇”，经越南去昆明转入大后方。在海防目睹法国殖民者残忍殴打越南人民，无不深感亡国的痛苦。到了昆明，七人像迷途的羔羊，不知找谁来帮忙。可幸第二天云南教育厅的战区流亡学生收容所把我们安顿了下来，并给我们战区学生发贷金，那时深深感到祖国的可爱。很快我被分配到云南楚雄中学继续未完的高中课程。

楚雄这山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能从航空学校的学员和行走滇缅公路运输军火商品的西南运输公司的广东司机那里知道一些外界的消息。我们十几个流亡学生，在一位从新四军出来、名叫郭凤仪的女同学的带领下，出壁报，唱救亡歌曲，到处宣传，把整个山城闹得热气腾腾。一年过去，高中毕业了，我们这一批流亡学生，有的报军校，有的当了航空兵。那位从新四军来的女同学，见我身体瘦弱，善于动笔，劝我还是留在大后方读大学，或去延安考抗大。于是我搭西南运输公司广东人的便车流落到重庆。刚好遇上了5月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那天是搬到重庆北碚的上海复旦大学的入学试，我报的是新闻系。因在大轰炸中受伤而没有考。在歌乐救伤医院包扎后，偶然遇到一位善良的广东前辈，名叫梁良，他是中国航空公司的职员。他留我在他家住了两天，知道我想上延安，刚好有公司的便车到成都，便送了我一程。他太太沈灿还送我一百元作路费。我住在成都华西坝她的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是华西大学的一位教师。当时全国金陵、齐鲁、燕京、岭南、金女大儿所教会大学都搬到成都华西坝。那位教师是教会人士，劝我不要到延安，就在华西坝上大学

好了，并介绍我认识后来加拿大劳动党的主席文幼章教授。那时他是英语教师，圣工会的圣职人员。但他是有名的热爱中国的人士，他的家成为在成都往延安爱国人士的转运站。有一个晚上，一批从各地来准备到延安的青年在他家里集会，我也参加了，突然大门被一群国民党兵痞打开，说要找共产党人。我们都吓得往后园躲。但文幼章却挺身而出，把上衣一扯，拍拍胸膛大声喊叫：“谁敢来我家拉人，喔老子，你们敢开枪，就向我这里开好了！”把兵痞的枪拉到他胸前。兵痞想不到这洋人胆子这么大，愣了一愣，连那领队的也被吓倒了，赶忙说“误会，误会”，把手一挥，一批原来气势汹汹的兵痞悻悻地退走了。40多年后，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讲学，住在他家，谈起这事，我问他当时害怕不害怕，他大笑说：“喔老子，我便知道这些龟儿子是不敢动洋人的，最多给几个钱他们就是了，闹大了我还会反告他们扰乱外国人一状！”后来他成了新中国的老朋友，但在苏联问题上出了些错误。另一次在国外见到他，他惭愧又抱歉地说：“我不听周总理的话，我又犯错误了！”

上教会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1941年进入了教会办的齐鲁大学，过去满腔热血、意气风发，生活在富家子弟教会大学的同学中以后，逐渐冷却下来，只希望在歌舞升平的华西坝大学中平静地读书。眼看着上延安的青年被国民党杀死在途中，我退缩了，害怕了，延安不敢去了，还自欺欺人地走上了“读书救国”的道路。

教会大学的教育的确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前嫉恶如仇、激烈反抗社会的活动渐渐没有了，整天夹着几本大洋书，埋头在图书馆读书。那时陈寅恪、顾颉刚、钱穆三位国学老师分别在华西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他们三人轮流，每隔两周便从躲飞机空袭的乡下住处回华西坝上课。每到上课那一天，我们学生吃完饭便赶着到教育学院阶梯教室站队，不是争座位，因为